

一项经典研究的诞生： 知沟假说早期研究史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董晨宇

摘要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传播学领域开始对自身研究历史进行自反性书写，反思并批判了传统意义上的智识史与传记史。本研究以此为基础，借助知识社会学视角，从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两种取向出发，重新解释美国早期“知沟假说”的提出背景与理论推广过程。研究发现，从外部视角来讲，知沟假说的提出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改革运动和教育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可以被视为传播学对“伟大社会改革”的一次直接介入；从内部视角来讲，知沟假说作为一项研究议题，之所以可以获得较大发展，与明尼苏达小组的学术推广工作，以及美国北部农业州各增地学院的参与息息相关。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以知沟假说为例，实践并倡导一种知识社会学取向的传播学史研究。

关键词

知沟假说、知识社会学、伟大社会、科尔曼报告、增地学院

作者简介

董晨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电邮：dongchenyu@bfsu.edu.cn。

The Birth of a Classic Research: Investigating Early Knowledge Gap Studies from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DONG Chenyu

Abstract

Since 1990s, communication scholars began to self-refle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disciplinary history and criticiz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biographical history writing. Based on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is study adopt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rspective to re-examines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diffusion of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during 1970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birth of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is embedded in the

Great Society Plan and relevant education studies during 1960s. Besides,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as a research agenda is assisted by both the efforts of Minnesota team and various scholars from land-grant 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agricultural st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to advocate an investigation of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using sociology of knowledge.

Keywords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reat society, coleman report, land-grant university

Author

DONG Chenyu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Email: dongchenyuz@bfsu.edu.cn.

1970年,明尼苏达大学的三位研究者菲利普·蒂奇诺(Phillip Tichenor)、乔治·多诺霍(George Donohue)和克拉丽丝·奥利恩(Clarice Olien)在《舆论季刊》上发表《大众传播流动与知识差距增长》一文,提出了知沟假说:“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公共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Tichenor, Donohue & Olien, 1970)这一理论假说背后隐藏的重要意义在于,公共知识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的落后隐喻着权力的丧失。如果知沟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大众媒体不但不能弥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知识获取层面的不平等,反而会加剧这种不平等。凭借这样一种独树一帜的社会批判意识,在美国早期的传播效果研究中,知沟假说成为了一项经典研究议题。仅在这一假说提出之后的25年内,相关的实证研究论文就已经超过70篇(Viswanath & Finnegan, 1996)。除此之外,知沟假说的研究领域中也出现了大量的综述性文献(Gaziano, 1983; Gaziano, 1997; Kwak, 1999; Hwang & Jeong, 2009)。

如果对这些综述性文献进行考察,便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对知沟假说的历史书写都集中在其智识进展的回顾之上。换言之,这些综述都在尝试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知沟假说作为一项知识议题,是如何被制造、使用和升级的?然而,借用美国研究者杰夫·普利(Jeff Pooley)的观点来讲,大部分综述性文献都趋向于强调一种新科学的进步性演变,本质上充满了掩饰性和辉格主义特征,其效果和功用更多是“范式的继承、推广和模仿,而非反思和批判”(Pooley, 2008: 3)。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传播学界掀起了一股重写传播学史的浪潮,旨在从根

本上反思这种图腾崇拜式的教规书写，更多将理论还原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和学科建制之中，重新关注知识议题“为什么增长，又如何增长”的问题（克兰，1988：2）。研究者开始关注冷战（辛普森，2017）、发展中国家不结盟运动（Nordenstreng, 2004）等社会事件，以及研究基金变迁（Pooley, 2011: 211-240）对于传播学理论发展的影响。然而，对知沟假说这一经典研究议题而言，上述几个方面的反思至今仍旧十分贫瘠。

基于这一情况，本文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的知沟假说研究，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探讨知沟假说作为一项研究议题的“成名”之路。具体而言，本文采取一种外部主义和内部主义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知沟假说研究诞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知沟假说为何可以从众多相似的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项传播学经典研究议题？

一、传播理论史的重写：知识社会学的贡献

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学史可以被分为两种书写策略，分别为智识史与传记史（Löblich & Scheu, 2011）。智识史聚焦于知识的逻辑演化，即传播学理论的背景、起源、范式、问题、方法和主张等。代表性文献包括《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与《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与理论》等。传记史则聚焦于个体研究者的生平传记和研究经历，这种书写方式试图进入到研究者的生活世界，对其个性、经历、信仰等因素进行考察。代表性文献主要包括《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和《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史写法》等。这两种写作策略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智识史固然有助于塑造整个学科的身份认同和理论共识，但它对于理论史的解读往往是进步主义的。传记史则表现出这样一种认识论倾向：传播学研究的进展是必然和偶然相交织的产物。它放大了个体研究者的主观意识，本质上凸显了“伟人创造历史”的历史观。

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传播学界开始出现了一种重写传播理论史的努力。这一努力尝试脱离编年史和伟人史的考察策略，将学术界视为社会整体中的一个子系统，从“学术演进”的讨论转向为“社会关系”的讨论，其中既包括知识分子与社会历史情境的互动关系（即外部主义取向），也包括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内部主义取向）。

外部主义和内部主义的研究策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两种传统历史书写的弊端。外部主义取向不满智识史过于注重思想对于社会的作用，与此相反，它采取一种卡

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视角，试图将理论重新放置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关注社会存在因素对于思想的价值（林建成，2011：25）。内部主义取向拒绝接受传记史中所强调的某一位研究者的伟人光环，而把研究者还原到学者之间所建立的“无形学院”之中，考察学者之间的“非正式讨论、合作发表论文情况、教师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同事对研究问题和研究技巧产生的影响”（克兰，1988：38）。本研究旨在将外部主义与内部主义相结合，重新考察1970年至1979年间，知沟假说研究领域内的文献与整个美国时代背景的相互映照，以及这些文献间的内在勾连。

较早详细阐述知识社会学问题的学者是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中，他在“文化社会学”的背景下提出了社会知识的内容与本质这一问题。舍勒的论述是高度形式化的，他试图站立在一个高于一般化的人类本质学说的立场上，建立各种不同的思想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联（关永中，2004）。然而，在曼海姆看来，舍勒的思想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且含糊不清。与舍勒相比，曼海姆的贡献在于更为清晰地表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立场和研究问题。曼海姆认为，知识从不是从真空中产生的。他提取占星术中的“位系”（constellation）概念，结合进新的世界观中，认为知识的下一步发展不仅由各个理论问题的发展程度所决定，而且也由理论的外在因素所决定。因此，知识社会学“在对某一时期或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思想进行分析时，所关注的不仅是盛行一时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还有这种思想产生的整个社会背景。这就必须考虑某些社会集团接受或拒绝某种思想的原因，以及促使某些集团有意识的宣传这些思想并在更广泛范围内传播它们的动机和利益”（Zammito, 2006）。

对于“研究者与社会历史情境的互动问题”的考察，是以经典知识社会学研究为理论基础的外部主义者的关注重点，他们强调学术发展背后的社会生态——概而言之，即研究者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情境中所具备的意识形态对于研究本身的影响。当然，以上只是硬币的一面。若将研究系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领域，把研究者作为独立的生产者，那么，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同样需要关心学术研究中的机构设置和研究互动，也就是美国学者戴安娜·克兰（Diana Crane）所提出的“无形学院”（The Invisible College）（克兰，1988）。

早在1646年，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著名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便提出了“无形学院”这一概念。在当时，无形学院所指的其实是科学家以松散、柔性的方式所聚集、形成的一种研究网络。这种网络往往以沙龙、茶话

会等具体形式展开。20世纪发端的“无形学院”研究，已经与17世纪波义耳所提出的概念相距甚远，虽然借用这一名词，但研究者们主要则是受到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等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的思想的影响。默顿在他1938年的博士论文中便涉猎了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清教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科层结构与人格》一文中，默顿详细阐述了科层的组织结构、科层组织的负功能、研究人员过度遵从的结构根源，以及科层结构的非人格化等问题，他的探讨将知识社会学放置在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这一框架之中（默顿，2005：345-360）；与此相似，托马斯·库恩也不同意科学研究中的“自然淘汰”法则。库恩认为，科学发展是一种社会过程，共同体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十分关键。常规科学阶段中，研究者们正是依靠科学共同体聚集在一起，才能共享着大致一样的科学规范（库恩，2012：24）。例如，有学者考察了“为什么霍克海姆的思想比曼海姆在美国更加有影响力”这一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霍克海姆本人所参与的法兰克福学派为他提供了持续的研究焦点、资金支持和研究期刊。相反，曼海姆作为一个孤立的研究者，并不具备这一优势（Shils, 1970）。当然，研究者并不认为研究组织的支持可以决定真理与谬误，但在一定程度上，它所决定的是个体思想的命运。

基于以上外部主义和内部主义的知识社会学探讨，美国学者贝弗·格里菲斯（Belver Griffith）和尼古拉斯·穆林斯（Nicholas Mullins）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框架（Griffith & Mullins, 1972）。他们希望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研究史上，为什么有些原创思想得到发展，而更多的思考被淹没在学术研究的浪潮之下呢？在他们看来，一个成功的理论需要同时具备三个要素：优秀的思想（good ideas）、学术领导者（intellectual leadership）和组织领导者（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所谓优秀的思想，并不仅仅是指某一思想在学术层面有多么出众，更重要的是，这一思想是否可以解决现实问题，以及它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所谓学术领导者，即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领袖，他们的主要任务包括为工作确定最初的概念基础、对理论和研究做出公开的表述、定义本领域研究的生产标准、范文，同时担任这一研究领域的交流枢纽；所谓组织领导者，并不一定是一位学者，也可以是一个研究机构，他（它）的主要任务则在于安排研究日程、资金、设备和沟通方式。简言之，一个成功的理论既需要回应重要的时代问题，也需要依靠其学术层面和组织层面的领导者加以推广。

于此，本研究借用格里菲斯和穆林斯的研究思路，通过社会语境和文献文本

的分析，辅之以对知沟假说提出者之一菲利普·蒂奇诺教授的邮件访谈，去考察“知沟假说”作为一项研究议题的成名之路¹。本研究先从外部主义视角出发，探讨知沟假说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的关系，即将1970年蒂奇诺等人所发表的知沟假说研究放置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政治语境中，探寻知沟假说研究的社会政治资源。同时，本研究还要回到知沟假说所栖身的学术体制和这一研究领域精英的互动之中，考察知沟假说在学术界的知识扩散：为什么是知沟假说，而不是其他类似的研究假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引发大量研究者的兴趣，并不断生产出后续研究？

二、重访1970：知沟假说诞生的时刻

曼海姆曾将知识社会学的根本问题描述为“为什么世界就是以那样的方式呈现自己的”（曼海姆，2009：257）。本研究同样需要提出一个相似的问题：为什么明尼苏达小组的三位研究者会在1970年采取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关注知识差距问题，进而提出了知沟假说？

按照蒂奇诺本人的回忆，知沟假说最初的研究设想和部分数据，实际上源于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进行的多项研究（与蒂奇诺教授的邮件访谈，2013）。其中之一是他的博士论文《美国成年人口中的传播与科学知识》，另一个则是他与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一起进行的有关“信息扩散”的研究项目。这一项目由美国教育部和美国统计局资助，主要探讨了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科学和健康信息的寻求模式，研究成果呈现为1967年出版的《知识与公众心灵》（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Mind）一书。从这本书中也可以窥探出知沟假说的若干雏形设想，其中一点便是教育程度决定了人们的媒介使用习惯：低教育程度者往往通过电视获取信息，高教育程度者更加倾向使用纸媒作为主要的新闻和信息来源，后者的选择“可能会带来更多和更深的知识”（Wade & Schramm, 1969）。

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之后，蒂奇诺来到明尼苏达大学，担任新闻与大众传播学助理教授，并在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实验站进行科研工作。这个实验站大约成立于1893年，其中包括13个学部，大多与农业科学相关，仅仅有两个学部除外，即农村社会学部和信息与农业新闻学部。蒂奇诺就职于其中的农业新闻学部，明尼苏达小组的另两位成员多诺霍、奥利恩则就职于农村社会学部。三位学者的研究均受到了这个实验站的影响和支持。1970年发表的知沟假说研究，也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实验站27-18项目的资助。

实际上,在1970年之前,明尼苏达小组的三位研究者合作发表的论文至少已经有5篇。纵观明尼苏达小组的早期合作,可以看见一条清晰的研究脉络,即“农业社区的信息传播”(Tichenor et al., 1973: 45)。和当时很多研究小城镇和农村问题的学者一样,他们关心“具有某个具体社会目的的传播行为——提升居民健康、告知农民新技术和食品生产技术,以及增强他们对于政府政策的理解等”(与蒂奇诺教授的邮件访谈,2013)。

这种研究兴趣恰恰回应了战后美国农村社会学的一项重要议题:农业创新技术的社会扩散。这一领域向前可以追溯至上世纪40年代关于杂交玉米种子社会扩散的经典研究(Ryan & Gross, 1943)。自20世纪5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农村社会学者开始思考如何让一项农业创新技术快速在社会中扩散。到了60年代初,作为集大成者的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则正式提出了“创新的扩散”理论(罗杰斯,2016)。

蒂奇诺回忆说:“当明尼苏达小组考察这些研究中的‘早期采纳者’,发现他们能更快速地完成这一过程、更快速地阅读相关信息、更充分地消化这些观念时,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预测:比起晚期采纳者,这些早期采纳者会在创新扩散的过程结束时接受更多的信息。这似乎是扩散研究中固有的结论。我们的工作就是进一步指出:任何新议题上信息流通的增加都会造成更大的知识差距。”(与蒂奇诺教授的邮件访谈,2013)换句话讲,如果创新的扩散理论探讨了创新的社会流动过程,那么,明尼苏达小组所做的事情,就是向前更进一步,探讨创新的社会流动结果。

不过,在知沟假说诞生之前,传播学领域就已经存在大量对于“知识差距”的研究。1947年,有学者发现在传播活动中,对公共信息所知甚少者是相对固定的一群人。他们称其为“长期无知者”(Hyman & Sheatsley, 1947)。1950年,有学者发现富有、高学历的社区居民普遍对外部事件更为关注,对大众媒体使用更加频繁,这些人获取知识的速度也更快(Bogart, 1950)。1951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信息获取水平与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和社会参与度等指标呈相关性”(Nafziger & Engstrom, 1951)。1954年,有学者对“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去世”这则新闻的扩散进行研究。他们发现不同种族之间的知识水平存在着显著差距(Larsen & Hill, 1954)。1965年,有学者发现蓝领、年长且生活在廉价公寓中的工人往往是获取公共信息最少的人群(Spitzer & Denzin, 1965)。简言之,这些丰富的研究文献从职业、社会参与度、教育水平、种族、性别等不同视角试图定位知识贫困者的人口学特征。反观明尼苏达小组,他们为何单独选择社会经济地位进行

考察呢？

这要回到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背景中进行分析。三位学者的合作恰好赶上了美国社会一场剧烈的变革运动。1964年，也就是蒂奇诺来到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前一年，在俄亥俄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提出，美国不仅有机会成为一个富裕并强大的社会，而且还有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这也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改革。在伟大社会改革中，教育不平等成为了核心议题之一，1965年，美国通过的《中小学教育法》，第一次向中小学提供联邦援助。相仿，在同年的《高等教育法》中，美国政府第一次决定向贫困大学生提供奖学金和低息贷款。在这种社会语境之下，1966年，教育学也因此迎来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科尔曼报告》（The Coleman Report）。

《科尔曼报告》源于1964年美国人权法案中的第402款之建议：“专员应该进行一项调查并在两年之内将调查结果呈交给总统和国会。报告的内容包括因为种族、肤色、宗教或民族原因，在全美国范围内公立教育机构存在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但是，报告所呈现的结果却有些让人出乎意料：相比学生的家庭背景来讲，学校带给一个孩子在知识上的影响并不大。也就是说，孩子的知识获取主要受到孩子的家庭、邻居带来的影响，这种不平等会一直带入到孩子走出学校后所面对的成人生活中（Coleman, 1966: 325）。换句话讲，根据《科尔曼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孩子本人的知识水平主要被其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影响。

《芝麻街》（Sesame Street）的失败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科尔曼报告的洞见。作为教育改革的一种回应，电视学前启蒙节目《芝麻街》于1969年正式开始播出，这个节目旨在为贫穷家庭的孩子提供必要的教育信息，以图缩小贫富家庭孩子之间的知识差距。次年，纽约儿童电视工坊和普林斯顿教育测试服务中心联合发表了年度回顾报告，得出了相对乐观的结论：“芝麻街节目的播出使得市中心和边远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与郊区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都受益。收看越频繁的孩子学习的知识越多。”（Samuel & Ann, 1970: 1）然而，它却回避了《科尔曼报告》中所指摘的核心问题。因为虽然经常收看芝麻街节目的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学到的东西程度相似，但问题在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更可能经常收看这一节目。因此，在整个社会系统中，芝麻街项目反而为这两个群体的儿童制造了更大的知识鸿沟（Donohue, Tichenor & Olien, 1973）。

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学研究对明尼苏达小组产生了重要的启发。当回忆起研

究的初衷时，蒂奇诺指出了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浪潮对于知沟假说的影响：

“事实上，在发表第一篇《舆论季刊》的文章时（注：即1970年提出知沟假说的论文），我们时刻都在想着《科尔曼报告》。芝麻街研究同样暗示，这一项目对于高地位家庭的孩子来讲益处更大。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社会’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这么多人都开始关注这些问题的原因。”（与蒂奇诺教授的邮件访谈，2013）在另一篇回顾性文献中，明尼苏达小组同样明确指出了《科尔曼报告》对于知沟研究所提供的启发：“我们想指出，教育系统和大众媒介系统在功能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作为《科尔曼报告》的产物，教育研究如今越来越重视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这对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同样是有益的。”（Tichenor, Donohue & Olien, 1973）伟大社会改革和相关的教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尼苏达小组以“社会经济地位”等指标来考察知识平等这一话题，而非以往研究者更多关注的种族、性别、年龄、政治立场等指标。

由此看来，知沟假说的建构并不仅仅是理论的推演，同时也是对科学主流范式和社会运动的回应。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研究经历让蒂奇诺等人关注知识流动这一议题；伟大社会运动引领他们聚焦于技术流动的后果，也就是社会不平等这一问题。来自教育学的研究则进一步让他们关注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知识获取的影响。接下来，我们需要从内部主义取向出发，考察为什么知沟假说可以从众多相似的研究之中脱颖而出，引起众多后续研究者的关注。

三、重访北部农业州：知沟假说研究的扩散地图

上述分析虽然梳理了知沟假说形成的社会历史语境，但并不能完全解释知沟假说为何可以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一项传播学经典研究议题。实际上，在知沟假说被提出之后不久，便出现了诸多相似的研究设想，这些设想拥有不同的名称，例如信息贫困（Childers, 1975: 78）、信息沟（Katzman, 1974）、传播效果沟（Shingi & Mody, 1976）等。这些研究假说的内涵大致相似，有些甚至比知沟假说的理论构建更加成熟。但为什么知沟假说能从众多相似的研究中脱颖而出呢？

按照“无形学院”的视角，理论的成名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素质的问题，在相似理论间的竞争中，学术领导者和组织领导者也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于此，我们便需要回到上世纪70年代知沟假说的研究图景中，考察这一研究议题在学术共同体内呈现出怎样的扩散规律。在此本研究关注三个问题：在1970年至1979年间，出现了多少知沟假说的后续研究？谁在其中起到了学术领导者的作用？这些研究者之间

是否存在着某种统合性因素?

本研究将“后续研究”定义为针对知沟假说进行的实证研究或综述性研究,来源包含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文献搜索的渠道主要有三:第一是通过谷歌学术搜索关键词“knowledge gap”,第二是搜索知沟假说综述性文献中提到的研究文献,第三是通过所获取的论文中的参考文献进行进一步筛查。如此,本研究获得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1970年至1979年间,一共出现了22篇知沟假说的后续研究(见表1)。

表1: 1970-1979年之间发表知沟假说研究

时间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所在院校(机构)
1970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Tichenor, P.	明尼苏达大学
1971	The public, the media, and the knowledge gap	Bailey, G.	明尼苏达大学
1971	The knowledge gap: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academic and the foreign policy communities	Hermann, F.	俄亥俄州立大学
1972	Communication, stratif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formation in a developing urban society	McNelly, J.	威斯康星大学
1972	Mass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diffusion	Robinson, J.	密西根大学
1973	Community issues, conflict, and public affairs knowledge	Tichenor, P.	明尼苏达大学
1973	Mass media functions, knowledge and social control	Donohue, G.	明尼苏达大学
1974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Katzman, N.	公共广播集团
1974	Media effects reconsidered: some new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larke, P.	密西根大学
1975	Mass media and the knowledge gap reconsidered	Donohue, G.	明尼苏达大学
1976	Issue legitimation, mass media functions and public knowledge of social issues	Nnaemeka, T.	明尼苏达大学
1976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gap: a field experiment on television and agricultural ignorance in India	Shingi, P.	印度管理学院
1976	News media exposure,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campaign interest	Atkin, C.	密西根州立大学
1977	Deficits, differences, and ceilings: contingent condi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gap	Ettema, J.	密西根大学
1977	Differential knowledge gain from a media campaign: a field experiment	Scherer, C.	威斯康星大学
1978	Effects of year-long newspaper energy series on reader knowledge and action	Abbott, E.	爱荷华州立大学
1978	Toward explaining citizen knowledge about a proposed reservoir	Bultina, E.	爱荷华州立大学
1978	Local media coverage of community issues: does it widen the knowledge gap?	Tainter, S.	威斯康星大学

1979	Interests in news and the knowledge gap	Genova, B.	雪城大学
1979	Involvement in news events and 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Egucke, C.	威斯康星大学
1979	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and media dependence: an initial study	Fry, D.	俄亥俄州立大学
1979	Equivalence of inform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1976 presidential debates as a source of influence	McLeod, M.	威斯康星大学

这段时间内的知沟假说研究扩散有以下几点特征。首先,最初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蒂奇诺等人组成的明尼苏达小组为主。在这22篇研究论文中,明尼苏达小组一共撰写了4篇,且全部发表在知沟假说诞生之后的前6年,在1970—1975年间发表的所有相关研究中,占将近一半的比例。明尼苏达小组作为原创理论的提出者,在提出知沟假说之后,仍旧持续在这个领域进行开拓,承担了这一领域的学术领袖角色。除去1970年的开创性研究之外,发表在1973年的两篇论文重点探讨了明尼苏达大学小组对知沟假说的反思,以及知沟假说的深层社会意义。具体来讲,1973年,三位学者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了与知沟假说相悖的结论。于是,他们开始借助社会冲突论的视角,重新考察既有假说可能存在的缺陷(Tichenor et al., 1973: 45);在同年的另一篇论文中,明尼苏达小组重点重申了知沟假说的社会意义:“如同市场垄断一样,知识垄断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社会目标……仅就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而言,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趋向,即在媒介内容会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强化知识精英的社会地位。”(Donohue, Tichenor & Olien, 1973)接下来,在1975年,明尼苏达小组从社区议题显著性、社会冲突性、社区特质、公众注意力四个方面对知沟假说进行了系统性补充(Donohue, Tichenor & Olien, 1975)。在明尼苏达小组的学术推动下,这一阶段可以被视为知沟假说的成长期。

在1970—1979年之间,除去明尼苏达小组的研究,还出现了18篇其他研究者发表的知沟假说论文。这些研究之间是否呈现出某种共性呢?如果我们聚焦于这些研究者所在研究机构的地理分布,可以发现研究者主要集中在这样6所大学:威斯康星大学(5篇)、密西根大学(3篇)、俄亥俄州立大学(2篇)、明尼苏达大学(2篇)、爱荷华州立大学(2篇)、密西根州立大学(1篇)。这6所大学所在的5个州,恰恰都位于美国北部,都是开阔的平原地貌,土壤肥沃,农业发达,且在地理上依次接壤。在这6所大学中,除去密西根大学之外,全部都是美国“赠地学院”(Land Grant College)。

赠地学院的出现源于美国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在美国建国初期,大部分人

口聚集于东海岸。相比之下，中西部居民相对稀少。美国政府在18世纪8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法案，推动人口西迁。在迁徙的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成为了迫切需求的人才，但美国的农业技术教育却相对薄弱。为此，美国国会在1862年推出了《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要求“每个州留出一定数量的公共土地……其目的是帮助各个州建立教育机构，让农村青年受益。学校的主要目标是传授与农业和机械工程相关的知识”（洛厄里 & 德弗勒，2009：75）。到1922年，美国赠地学院的数量已经达到了69所。这些学院中大多专门成立了农业研究站，这也直接推动了农村社会学的研究（熊文春，2009）。

早期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体系问题。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农业产品价格暴跌，以及1934年与1936年美国两次严重的干旱，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者逐渐将视野转移到农业人口对于新技术（如新型抗生素和杀虫剂）的了解和应用方面。这也从一个侧面推动了创新的扩散理论的发展。实际上，创新的扩散理论提出者罗杰斯本人就曾学习农学专业，其所在的学校——爱荷华州立大学——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赠地学院。总而言之，对信息扩散及其后果的关注，成为了这些赠地学院研究者参与知沟假说研究的前提。知沟假说研究的最初扩散，也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美国北部各州的赠地学院作为机构性保障，从而生产出大量的研究者。

除去研究旨趣相投的因素，这些北部农业州大学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流动也十分频繁。以1977年的论文《缺陷、差异和上限：理解知沟的条件影响》为例（Ettema & Kline, 1977），两位作者都来自密西根大学。其中，第一作者詹姆斯·艾特玛（James Ettema）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曾和蒂奇诺等人共事；第二作者杰拉德·克里恩（Gerald Kline）不仅在1972年与蒂奇诺合编了《当代大众传播研究的视角》一书，而且在这本书中讨论了知沟假说问题，他本人还参加了明尼苏达大学的心脏健康研究项目。

总而言之，在知沟假说最初十年的研究发展中，明尼苏达小组的三位研究者起到了学术领导者的作用。而美国北部农业州的多所大学，尤其是其中的赠地学院，也对知沟假说的研究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学校的传播学者之间不仅研究旨趣彼此相近，交流也非常频繁。事实上，若是将视野向后继续追溯，在整个知沟假设的研究图景中，大量后续研究也都出自这些农业州赠地学校。从今天来看，至今仍活跃在这一领域的最有影响的研究者塞西尔·加齐亚诺（Cecilie Gaziano）同样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并且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正是蒂奇诺本人。从这些错杂的交

往关系中，我们足以梳理出关于知沟假说的“无形学院”的脉络。

四、结语

本研究试图采取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从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两种取向出发，重新解释知沟假说作为一项传播学经典研究议题的成名之路。从外部社会语境来讲，三位来自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研究者之所以从农业信息扩散的研究转向关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知识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伟大社会改革的召唤，同时，他们又被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学研究和实践——主要是《科尔曼报告》和《芝麻街》项目——所深深影响。换言之，这项研究假说实际上是传播学对伟大社会改革的一次直接介入和回应。从内部学科建制的角度来讲，虽然在知沟假说之前，已经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知识水平之间的关联性，但这些研究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逐渐偃旗息鼓。知沟假说作为一项研究议题，之所以可以获得较大发展，一方面与美国北部诸多增地学院的参与和推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明尼苏达小组自身的研究努力。他们通过对理论进行后续的解释和修正，担负了早期知沟假说研究的主要推广工作。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知沟假说，但所言之物，又不仅仅是这一假说本身，更是一种考察传播学史的视角：一项研究的提出和发展过程中都充满了理论内外的较量。理论本身的因素当然不能被幼稚地排除出考察的范围之外，然而，所谓的“社会存在”——不论是外部主义者所强调的社会历史分析，还是内部主义者所关注的学科建制、研究者的非正式关系等因素——也在整个理论发展历程的背后，闪现出一双看不见的手。

对于传播学这样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来说，借用何种学术资源和视角解释、推进自身领域的某一研究子集，一直是研究者们反复思索、摇摆的命题。它像极了美国学者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所称的“丝绸之路上的商队”（Abbott, 2001: ix），其中充斥着琳琅满目、花样繁多的学术工具。在外部主义者看来，研究者的坐标选择会受到当时社会历史语境的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取舍在限定了某一种研究视角的同时，也遮蔽另一种研究视角。按照加齐亚诺的观点，在70年代的研究中，蒂奇诺等人偏向于认为“知识”是自然发生、价值中立，且可通过实证方法被观测的（Gaziano & Gaziano, 1999: 117-136）。然而，从社会建构理论的角度来看，知识本身往往并不是自然发生、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例如堕胎、气候变迁等以宗教或政治信仰为基础的知识）。利益集团会通过权力运作

的方式规训人们对知识的定义与解读。直到2009年,知沟假说研究领域才出现了重新定义“知识”的尝试,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辛德曼(Douglas Hindman)称之为“信仰沟”(Hindman, 2009)。当然,这种研究取向的变化也与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联系。

从内部主义的角度来讲,一项研究议题的推广并不仅仅依靠研究本身的理论素质,同时也需要依靠研究领导者和机构领导者的不懈努力。在早期知沟假说研究中,明尼苏达小组和美国北部各州的赠地学院担负了理论推广的重要职责。当然,在传播学史中,这样的案例其实也并不少见。例如,G. 芬克豪泽(G. Funkhouser)与麦库姆斯等人几乎同时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而且在研究设计的精密程度上,也要超过麦库姆斯的研究(Funkhouser, 1973)。然而,在议程设置的研究历史中,芬克豪泽的重要性却被很多学者所忽略。詹姆斯·迪林(James Dearing)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答案在于:相较于麦库姆斯和肖,芬克豪泽的研究没有很快被其他学者在实证研究中进行验证,他本人也没有在此之后继续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Dearing & Rogers: 1996: 45)。

本研究当然无意质疑明尼苏达小组为知沟假说所付出的理论努力和理论贡献,而是试图在传统传播学史研究的路径之外,寻找一种知识社会学的书写方式,将目光转向理论“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这种考察路径也为传播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自反性机会。总而言之,传播理论史的重新书写,在纠缠于理论本身的逻辑之外,同样需要回到具体历史背景中,对“社会存在”进行反复考察——这里面既包括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变迁,同时还包括学科建制、无形学院的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在知沟假说之外,传播学领域还有着数量庞大的经典理论。然而,对于很多中国本土的传播学研究来说,这些理论仍旧停留在教科书的“地图”层面。于此,未来研究可以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工具对这些理论进一步进行挖掘。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第一是资料的丰富性。明尼苏达小组的三位学者虽然在传播学研究史中享有盛誉,但客观上讲,他们并没有留下太多的个人研究笔记和生活传记可供参考。本研究大多数的资料都是通过论文、研究机构公告所获得的。当然,能够通过邮件采访到蒂奇诺教授本人,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第二,本研究主要的精力放在了20世纪70—80年代的知沟假说研究中,并未对整个知沟假说的研究历史进行分析。为了获得对知沟假说研究历史更加完整的理解,后续研究仍然需要对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知沟假说文献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

(责任编辑:毛湛文)

注释 [Notes]

1. 对菲利普·蒂奇诺教授的访谈通过邮件形式进行,时间为2013年11月23、24日。访谈主题包括明尼苏达小组的形成与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转向、当时的社会政治语境、知沟假说的社会意义、20世纪70年代知沟假说的后续研究与理论争议,以及知沟假说对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启发性价值。

引用文献 [References]

- E. M. 罗杰斯. (2016). 《创新的扩散》(第5版).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Rogers, E.(2016).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ition).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 戴娜·克兰. (1988). 《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 北京: 华夏出版社.
[Crane, D.(1988). *Invisible colleges: Diffusion of knowledge in scientific communitie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关永中. (2004). 谢勒知识社会学的背景——文化社会学. 《台大文史哲学报》, 60, 265-296.
[Kwan, W.(2016). Sociology of culture as the background of Scheler' 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Humanitas Taiwanica*, 60, 265-296.]
- 卡尔·曼海姆. (2009).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Mannheim, K.(2009). *Ideology and utopi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林建成. (2011).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Lin, Jiancheng.(2011). *Mannheim' 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Zhengzhou: Henan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 罗伯特·默顿. (2005).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南京: 译林出版社.
[Merton, R.(2005).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anjing: Yilin Press.]
- 托马斯·库恩. (2012). 《科学革命的结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Kuhn, T.(201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辛普森. (2017). 《胁迫之术: 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Simpson, C.(2017).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希伦·洛厄里, 梅尔文·德弗勒. (2009).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owery, S. & DeFleur, M.(2009).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ird editio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熊文春. (2009). 农业社会学: 渊源、发展及其主要理论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6(1), 88-100.
[Xiong, Wenchun.(2009). Sociology of agricultur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its major theoretical

- issues.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6(1), 88-100.]
- Abbott A. (2001). *Chaos of disciplin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of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60). Seventieth annual report.
- Bogart, L. (1950). The spread of news on a local event: A case histor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4(4), 769-772.
- Coleman, J. (1966).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Childers T. (1975). *The information-poor in America*. New Jersey: The Scarecrow Press.
- Dearing, J. & Rogers, E. (1996). *Agenda setting*. London: Sage.
- Donohue, G., Tichenor, P. & Olien, C. (1973). Mass media functions, knowledge and social control. *Journalism Quarterly*, 50(3), 652-659.
- Donohue, G., Tichenor, P. & Olien C. (1975). Mass media and the knowledge gap: A hypothesis reconsider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 3-23.
- Ettema, J. & Kline, F. (1977). Deficits, differences, and ceilings: Contingent condi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gap.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 179-202.
- Funkhouser, G. (1973). The issues of the sixt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in the 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7(1), 62-75.
- Gaziano, C. (1997). The knowledge gap: An analytical review of media effec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0(4), 447-486.
- Gaziano, C. (1997). Forecast 2000: Widening knowledge gap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4(2), 237-264.
- Gaziano, E., & Gaziano, C. (1999). Social control, social change and 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In Demers, D. & Viswanath K. (eds.), *Mass media,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change: A macrosocial perspective*.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Griffith, B. & Mullins, N. (1972). Coherent social groups in scientific change. *Science*, 177(4053), 959-964.
- Hindman, D. (2009).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ly disputed beliefs: The belief gap hypothesi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6(4), 790-808.
- Hwang, Y., & Jeong, S. (2009). Revisiting 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A meta-analysis of thirty-five years of research.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6(3), 513-532.
- Hyman, H. & Sheatsley, P. (1947). Some reasons why information campaigns fail.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1(3), 412-423.
- Katzman, N. (1974).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romise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4), 47-58.
- Kwak, N. (1999). Revisiting 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Education, motivation, and media u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4), 385-413.

- Larsen, O. & Hill R. (1954).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diffusion of a news ev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 426-433.
- Löblich, M., & Scheu, A. (2011). Writing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 sociology of science approach. *Communication Theory*, 21(1), 1-22.
- Nafziger, R., Engstrom, W. & Maclean, M. (1951). The mass media and an informed public.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5(1), 105-114.
- Nordenstreng, K. (2004).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its disciplinary nature. *The Public*, 11(3), 5-17.
- Pooley, J. & Park, D. (2008). Introduction. In David, P. & Park, D. (eds.),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New York: Peter Lang.
- Pooley, J. (2011) From psychological warfare to social justice: Shifts in foundation support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Jansen, S., Pooley, J. & Taub-Pervizpour, L. (eds.), *Media and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Ryan, B., & Gross, N. (1943). The diffusion of hybrid seed corn in two Iowa communities. *Rural Sociology*, 8(1), 15-24.
- Samuel, B. & Ann, B. (1970). *A summary of the major findings in "the first year of sesame street: an evaluation"*. Princeton: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 Shingi P. & Mody B. (1976).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gap: A field experiment on television and agricultural ignorance in In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171-190.
- Shils, E. (1970). Tradition, ecology and institution i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Daedalus*, 99(4), 760-825.
- Spitzer, S. & Denzin, N. (1965). Levels of knowledge in an emergent crisis. *Social Forces*, 44(2), 234-237.
- Tichenor, P., Donohue, G., & Olien, C. (1970).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4(2), 159-170.
- Tichenor, P., Donohue, G. & Olien, C. (1973).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volution of a structural model.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50(3), 419-425.
- Tichenor, J., Rodenkirchen, J., Olien, C. & Donohue, G. (1973). Community issues, conflict, and public affairs knowledge. In Clarke, P. (ed.), *New model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ousand Oaks: Sage.
- Viswanath, K., & Finnegan Jr, J. (1996). 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Twenty-five years later.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1), 187-228.
- Wade, S. & Schramm, W. (1969). The mass media as sources of public affairs, science, and health knowled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3(2), 197-209.
- Zammito, J. (2006). What's 'new'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Turner, S. & Risjord, M. (eds.), *Philosophy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Amsterdam: North Holland.